



《瓦猫》: 为匠人赋予文化的底色

心愿

葛亮的书读起来总是令人感到惊喜。这次的新书《瓦猫》由《书匠》《飞发》《瓦猫》三个中篇构成，其中《书匠》发表以后立刻被2020年全国高考命题组选中，成为全国二卷的现代文阅读题；《飞发》则斩获了《收获》和《十月》2020年度文学奖项。作为70后文坛实力最为强劲的作家之一，葛亮的小说素来广受好评，包括莫言、王德威、王安忆、毕飞宇、苏童等在内的诸多前辈作家，都对其赞誉有加。

《瓦猫》一如既往，有着独属于葛亮的文学气质。他的文章，几乎不用看名字便能从语言风格上认出来，那种不紧不慢娓娓道来，每一遣词造句都让人感受到中国文学自《诗经》《楚辞》以来的典雅味道。

葛亮的叙述是慢节奏之中的井井有条，这仿佛让人误以为故事容易平淡，但一层一层读下去，情绪却是汹涌的。技艺的传承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手，经由技艺造出的器物，却几乎以顽固之姿保留了当时的历史痕迹。譬如《书匠》中写到的每一本旧书，所采用的纸张、装帧手法，甚至多次修理的痕迹，几乎修书人只是略搭搭眼，便能清晰明白看出这本书的历史与经历。修书人是书籍的守护者，他们通过自己的独特技艺，使每一本书回到原本最好的状态中。如果书籍有生命，他们就是古籍的“续命人”。

但随着时代的前进，书店不断为市场淘汰，旧书店的生存空间更是被压缩得近乎完全退出人们的视野。

《书匠》所写金陵的修书人老董，香港的修书人简，以及简的徒弟静宜，三代人社会身份的变化，似乎也在说明这项技艺逐渐登高直至束之高阁的轨迹，正如修书人深居简出不问世事的生活方式，这是一项看着高大上，其实很难承继下去的技艺。

同样“日薄西山”的情绪也出现在另外两篇之中：《飞发》里源自不同派别的理发技术，在曾经的辉煌之后，现在只剩岌岌可危的藏于街边隐蔽一隅的小店，环境差，面积小，顾客越来越少；《瓦猫》中，毛果受人之托寻找制作瓦猫的陶艺人，原本兴旺的小镇如今已成为工地，几经波折终于找到，陶艺人的境况也很不堪。

工业时代里流行工业化的批量生产，物的制造与修补不再经由一双双有温度的手，无疑这是一个手工艺术式微的时代。但幸好还有葛亮这样的人，他们愿意在这个时代的边缘地带，寻找那些历史文化的痕迹，这些痕迹有时候是物，有时候是器，有时候是故事，有时候是人。他用他最擅长的文字为这些人事立传立言。

葛亮对匠人精神的追寻，起笔于距离我们十分久远的时代，但行文之中却并非呼唤某种远古技艺的“复生”，即使面对技艺式微的现实，他所表达出来的惋惜之情也极为克制。更多的时候，他的思考立足于当下：一件物什，一项技艺，为什么能够代代传承不息？不同行业的匠人，他们在面对各自的技艺时惊异地保持了相同的专注与坚守。

三代修书人，各有不同的风貌，但无论是来自旧时代的老董，还是接受了西方古籍修复教育的简，还是年轻一代也许还称不上合格修书人的静宜，不论自身的



《瓦猫》
葛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命运如何波折，当他们面对等待修复的旧书时，他们眼中的坚定却十分一致。

在工业化时代，人类的器物之爱，与物的关系，似乎都走到了某种尽头。在这样一个技艺式微的时代里，还令匠人坚守的，到底是什么？

葛亮只是寻找，他并未作出解释。但细读全文，想必每个人都会得到答案——我们重新思考这个时代人与器物的关系的时候，匠人其实从未远离过物。

《飞发》中源自两地的理发技艺，有过你死我活的竞争，也有盛极一时的辉煌岁月，在泾渭分明的分庭抗礼中最终不得不因时代变迁而逐渐式微，如同掉落在地的碎发扫进同一个撮箕中，他们终于在相互理解、相互欣赏中得到了彼此的认可与谅解——即便这是一个技艺式微的时代，从前的辉煌已如梦幻泡影，但代代传承的匠人之心，并不因站在时代的边缘而略有削减，物有来处，匠人才有归处。如《书匠》之中简与静宜的微妙关系，读到最后竟使人分不清，究竟是人的生命与技艺融为一体，还是因技艺而有了人与人的命运纠葛。

我们所说匠人精神，并非单指技艺上的精益求精，而是如《瓦猫》中所描绘的匠人一般，他们是用自己的生命作为技艺的载体，以物的实现来完成自己的生命实现。简言之，技艺即是生命。

“人之所以造物，是对过往时间的体认。”——穿过重重历史，至今仍然活跃在云南地区的瓦猫，是身带着真实的历史细节来到我们面前的。在这一重意义上，物与人的关系，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隔膜，技艺及所造之物从故旧中来，人与物的关系变成人与历史的关系，物的存在意义也成为一段历史的代言人。因旧物的存在而生发的怀旧情绪，所指向的其实是某种共同的民族记忆与民族文化体认。因此，匠人的个体叙事上升到家国叙事与时代叙事，瓦猫所代表的民俗文化的承继，实际上也是这种集体记忆的承继，器物让人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之中不断追寻先辈的足迹而有了当下的鲜活生命。时代在变，技艺在不同的传承者手中有着不同的光彩，也许不是每一处历史细节都能得到真实回溯，但每个人都懂得其中的珍重之处，这才是匠人精神传承的核心所在。

匠人对手艺的继承，人对物的精神寄托与信仰，其实是对朴素深厚的文化审美、传统道德价值取向的流传与承继，无论人的命运如何流转，只要技艺内嵌的传统文化因子尚在，文化血脉就不会断绝，匠人的独特存在，确实意义非凡。



新书秀场

《我本不该成为母亲》
[加拿大]阿什莉·奥德兰 著
中信出版集团

为什么幼儿园的孩子对女儿避之不及？游乐场的意外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在其他人眼中如天使般的孩子，为何只让身为母亲的布莱丝觉得如此邪恶……一切都在揣测和未知中前行，直到小儿子的死，给了她致命的一击，击碎了婚姻，击碎了生活，也击碎了她对女儿的所有信任。本书作者阿什莉·奥德兰原为加拿大企鹅图书公司公关总监，因为要照顾两个孩子而辞去了这一职位，以自己的经历为蓝本创作了悬疑小说《我本不该成为母亲》，从女性视角讲述家庭的建立与破裂、母女之间复杂的亲密与疏离。



《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
[日] 清水洁 著
后浪 |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年10月26日，年轻女子猪野诗织在日本埼玉县JR桶川站前遭人持刀刺死。受害者生前因长期受到跟踪骚扰而多次向警方报案，警方却未予重视，最终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记者清水洁在调查这一事件的过程中，依从受害者生前留下的“遗言”引导，多方走访查证，在警方轻视线索、调查不力的情况下，以记者的身份找到了实行犯，进而揭露了警方对受害者生前报案的漠视、敷衍，以及案发后试图抹黑受害者、掩盖渎职事实的行为。此案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推动了日本《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的出台。本书则是对该事件的全记录。



《十九日谈：〈古诗十九首〉里的生活与英雄》
杨锐 著 刘鑫 绘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两千多年前，一众匿名诗人写下十九首五言诗，萧统编入《文选》，是为《古诗十九首》。后人赞它“天衣无缝，一字千金”。本书作者杨锐重访古典，却发现我们只不过重复着《古诗十九首》里同样的心事——思念、盼望、感慨、愤懑，同样经历着亲人久别、爱人背叛、中年劳苦、老之将至……十九首原诗，十九则解读，十九个故事，十九幅古风插画，十九首古诗临摹，从古诗中观照自己，是为《十九日谈》。



《2020年中国女性文学选》
张莉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青年女作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并不断从中汲取灵感。本书收录了邵丽、张怡微、淡豹、文珍、沈大成等二十位不同代际的女性写作者的文章，呈现女作家们寻找、辨析、体认世界的过程，讲述了或切近或遥远的迷人故事。书中既有儿女情长、家长里短，也有江河湖海、天地山川。这些来自女性的凝视和书写，正体现了当代中国女性文本的美。

《威海人史话》：写人的威海史

□刘德增

人本是历史的创造者，写人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二十四史”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的通史或断代史。钱穆说：“中国人写历史，则人比事更看重。”当然，列入“二十四史”的人物尽是些帝王将相、文人学士、孝子烈女之类，黎民百姓不得跻身其中。遗憾的是，以人物为书写核心的中国史学优良传统，并没有为我们所完全继承发扬，我们看到的历史著述，不论是大部头的通史，还是精致的简史，往往都是王朝更替、制度沿革、经济兴衰、文化成就、民族关系的历史，虽然不同的著作还有不同的模块，但都跳不出“见物不见人”的窠臼。

《威海人史话》写“人”，是围绕人的亲缘与地缘关系展开的，即以“人——家族——村落”为主线，写他们是哪里人，怎么到了威海的某个地方，如何生存、发展。这样的书写，不是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记住乡愁，留给当代人的时代价值，是家族的根脉之所在，是祖辈艰苦卓绝的创业史。

一个地方的“人——家族——村落”的历史，“正史”缺记，几乎是一片空白；官修的方志，也只有一鳞半爪的记载。因此，书写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族谱、碑刻、传说等，这些材料散落民间，必须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威海人史话》，基于海量的田野调查研究，作者跋山涉水、走街串巷，他们难以言表的付出，尽显于字里行间。

族谱、碑刻、传说等构成的民众记忆的历史，有别于“二十四史”构成的正史。例如，据《威海人史话》考证：“威海境内有文献记载最早出现并传承至今的姓氏”是姜姓，姜姓的发展史是：《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康公姜贷被放逐海上，食一城。战国秦汉之时，一城指一县。姜贷的食邑究竟在何处，今难以确指。但是，胶东一带的姜姓传说，秦始皇东巡，姜贷后裔担心遭到杀戮，姜相伯携家人逃往“通天岭”躲藏。秦始皇驾崩，姜氏的担忧解除，姜相伯携家人走出“通天岭”，在岭南建村，名曰“通岭”，后改为“峒岭”。明朝隆庆年间的那一场大水，将峒岭一分为二，遂成“东峒岭”“西峒岭”两村，随着人口繁衍，峒岭村难以容纳，子姜姓后裔不得不外迁，或建新村，或迁入其他村落。据《威海人史话》统计，仅威海市就有峒岭姜姓迁建或迁入的村落120多个。峒岭成为胶东姜姓的祖源

地，胶东的姜姓大多将祖籍追溯至此。

位于今乳山市徐家镇的“峒岭”，只是胶东姜姓的“祖籍符号”。“祖籍符号”是民众集体记忆、世代传承的共同祖籍，其基本特征是：将某个省、县、乡、庄，或某个城门、街巷、渡口，或某棵树等视为共同的祖籍。认同、归属在这些“祖籍符号”下的民众，其身份未必全是移民，其真正的祖籍也不一定在此。但是，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此为祖籍。“洪洞大槐树”移民、“直隶枣强”移民也见于威海一带，但威海一带最为盛行的“祖籍符号”是云南与“小云南”，《威海人史话》予以重点关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

入清朝后，“闯关东”渐成大潮。山东人是“闯关东”的主体，一般认为，在“闯关东”的人群中，山东人占80%左右。“死逼梁山下关东，走投无路下崴子”，是胶东地区的一句民谚，“崴子”即海参崴。“闯关东”也是《威海人史话》关注的重点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威海人史话》收录了荣成民间的一首歌谣——《一枝花捎书》，表达了妻子对“闯关东”的丈夫的思念之情，凄凉哀婉，这样的歌谣委实不多见。

“闯关东”的山东人，虽然有的在东北已经居住数百年，但他们始终不忘故里，那个让他们魂牵梦绕的山东老家，深深地烙在他们的脑海中，二三百过去了，他们凭借宗谱家乘、口耳相传，记忆着自己的祖籍。那些早期“闯关东”的山东人，记忆中的祖籍仅剩下“山东”。

《威海人史话》书写的“人——家族——村落”的历史，展示了威海一带的移民在人、地两生的环境下，重构亲缘与地缘关系，建构他们的“祖籍符号”。

“祖籍符号”是神圣的家园象征，积淀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追求。基于中华民族的故乡情怀、祖籍情感，从个体的祖籍到共同的“祖籍符号”所形成的“同根同乡”思想观念，是“祖籍符号”的本质特征。这个本质特征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及国家认同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

在当今中国社会，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故乡”已成为经过岁月洗礼沉淀下来的想象，“祖籍符号”也呈现出“代际衰减”的趋势。当此情况下，需要像《威海人史话》那样，重新审视“故乡”的意义，重构精神家园的乡愁，通过“祖籍符号”的再阐释、再弘扬，激活其生命力，促进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